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

此係黨內幹部讀物
閱後收回不得遺失

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爲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奮鬥中，在大革命、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進行了堅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與豐富的經驗。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人民，將在資本主義的歐洲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地應用於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爲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爲直接任務，而又地極廣、人極衆、情況極複雜、鬥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解決了列寧在論東方問題時所說『以前在共產黨人面前沒有提出過的』，『在任何一本共

產主義的書裡都找不到，但却必須加以解決的』許多問題。由於堅持了這一正確的毛澤東思想，並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鬭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與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與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與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與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與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與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與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鬭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以至於當反動

派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與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致使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並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着大革命時期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與思想上的偉大戰鬪。在這個戰鬪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於企圖分裂黨與實行叛黨的托陳取消派和羅章龍、張國濤等的反革命行爲，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鬪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列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及爲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與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他們的精神與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爲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爲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在這十年內有了偉大的發

展。我黨終於在內戰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與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爲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與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爲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爲『後車之鑑』，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爲着獲得抗日戰爭的澈底勝利與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第七次擴大的中央全體會議認爲：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爲代表的一小部分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認爲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

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爲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蔑當時的蘇維埃運動爲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要求，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與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而被驅逐出黨，接着並墮落爲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與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與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却爲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與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允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與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

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爲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大革命的失敗），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與革命失敗後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與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及在白區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與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間開會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中國大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發佈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鬭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與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與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六大也有其缺點與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與反動勢力的內部

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與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對於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與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但是這些缺點與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與極端擴大，仍然不足以掩蓋六大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六大以後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六大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六大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列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與影響之下，蘇維埃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白區黨的組織與工作，也有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與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着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後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於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蘇維埃運動的初步發展與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

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乃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與執行過程中，立三路線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與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與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與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他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蘇區（中央蘇區的主要部分）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

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粹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蘇區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三中全會的文件還充滿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與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着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與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與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三中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與糾正，因此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與左傾政策，在三中全會上與三中全會後還是濃厚地存在着。但是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左傾教條主義同志，却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澈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着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與左傾政策；他們在當時發表的『兩條路線』即『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及其他左傾思想與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爲新的左傾路線。

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與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與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與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與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爲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強調地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蘇維埃，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與『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鬭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却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餒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同志從各方面來的壓迫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經驗主義同志對於他們的妥協與支持之下，召開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與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成為內戰時期左傾路線第三次統治全黨的開始。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與『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儘管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着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却是『反右傾』。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與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與所謂『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准了那個代表着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小冊

子——『兩條路線』即『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鬭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份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爲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四中全會後接着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鬭爭的產物。在這些人中間，對於後來成爲真正右派、並墮落爲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爲首的極少幾個分裂主義者，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允許的。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夢雄等二十餘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爲黨與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蘇區和白區地方組織。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和新的領導機關，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鬭爭。

在四中全会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地運用和發展。接着，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中央蘇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與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四中全会後的中央還沒有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與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蘇區和紅軍，在同一時期與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與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新的高潮。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與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與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一致，與各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進攻中國革命的一致，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鬭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幾省首先勝利，與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

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蘇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週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與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中央蘇區，尤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蘇區與鄰近蘇區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蘇區黨大會與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蘇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四中全會的『反右傾』與『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蔑中央蘇區的正确路線為『富農路線』與『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與軍事領導；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确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反四次『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反五次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蘇維埃運動的挫折與

『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着』；判斷反五次『圍剿』的鬭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鬭爭』，說這一鬭爭將決定中國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復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民衆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與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鬭爭與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蘇區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蘇區反五次『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蘇區。左傾路線在退出中央蘇區及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退却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其他絕大多數蘇區（閩浙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贛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川陝蘇區）與廣大白區的黨，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統治過鄂豫皖蘇區與川陝蘇區的張國濤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與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退却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為領導的錯誤的左傾路線之主要內容。

教條主義的同志們披着『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着四中全會

所造成的政治聲勢與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時間有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與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却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等斷語下，竭力吹噓與事實相反的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機關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蘇區反五次『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與黨員群眾前面，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與不滿。在中央蘇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與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此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與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遵義開會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一切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